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逻辑理路与实践方略

涂良川,刘衍峰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已成为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二者的紧密结合,既能有效推动生产要素结构转型,增强经济体系的适应力与韧性,破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发展瓶颈,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筑牢物质载体与人力资本双重基础,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还能不断提升人口素质与社会福祉,实现经济增长与共享发展相统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非简单的资源并列或领域叠加,而是具有内在一致性与结构互补性的体系安排,二者在发展本体上确立“物”与“人”的辩证协同,明确物质基础与发展主体的互动统一;在发展目标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投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发展路径上体现快与慢、硬与软的协同演进,兼顾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与长期内生动力培育;在发展结果上形成经济系统与民生体系的共促并进,实现“经济-民生”循环互动格局。未来,二者紧密结合还需在结构配置、协同机制、区域统筹及主体协作等环节系统发力,优化资源分布,提升政策效能,推动各类投入要素相互融合、协同增效。通过构建融合导向的发展体系,逐步形成以物促人、以人提质、物人互促的整体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支撑与更稳定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十五五”规划;投资于人;投资于物;中国式现代化;人力资本;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1],并将其作为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这是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深刻变化的回应。投资于物主要指对经济社会运行所必需的有形资本要素进行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工业设备、公共工程、技术平台、能源系统等,是夯实现代化发展基础的重要支撑。在传统发展阶段,我国依靠投资于物的方式实现了经济高

速增长,基础设施、制造设备、工业产能等“硬条件”不断改善,城镇化、工业化、全球产业嵌入随之而来。现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新阶段,“铺摊子”、上项目的老路难以持续,投资重点自然要适时而变^[2]。投资于人主要指对人的投资,即人力资本和人本福祉的提高,包括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技能开发、就业服务、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这会直接影响人的发展能力、参与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升。长期以来,投资于人在制度政策中处于相对弱位,滞后性逐渐显现为内需不足、消费乏力、创新不

引用本文:涂良川,刘衍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逻辑理路与实践方略[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1):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5CKS091)

作者简介:涂良川(1976—),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与人工智能哲学研究。E-mail:tuliangchuan@scnu.edu.cn

足、人口结构紧张等深层次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追求民生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均衡发展,这意味着国家的发展战略更加重视结构、质量与人的全面发展能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根本内核就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3],并以系统协同方式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现实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模式在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等“物”的方面取得了明显优势,但是对“人”的持续性投资则相对缺乏。在此背景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成为塑造发展基础的重要理念,既体现了发展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的趋势,又呈现对公共投入回报和社会价值分配的进一步认识。

1. 推动要素结构转型,增强经济体系适应力与韧性

2024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22.0%,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至60.9%^[4]。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得传统的劳动力供给能力下降,单靠“物”的要素投入方式已经难以维持经济系统内在的弹性及抗冲击能力,必须通过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创新来优化要素结构,从而保持经济韧性。投资于物重视实物的资本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其作用在于构建实体经济的有形基础。而人力资源要素则涵盖劳动力素质、专业能力、适应能力和再培训机制等内容,对经济运行的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和柔性调整能力具有决定性影响。投资于物一般有明确的周期目标和项目导向,而投资于人则更具长期性和公共性,短期内很难形成可量化的经济产出。时间尺度、资源倾斜上出现的不均衡,影响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平稳过渡,推动“物”与“人”协同配置,实质上就是重新配置投入结构,实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的统筹规划与比例均衡。通过投资于物和

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区域发展方面有利于解决地方发展中重建设轻服务、重硬件轻人力的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没有配套足够的教育、医疗、社区服务投入,造成了物质平台建成后不能高效运行。而加强“人”的投入,可以使“物”的作用发挥得更稳定、更可持续,“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健康的关系,实现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和增长源泉。”^[5]

从周期性波动角度分析,经济系统抗冲击的能力并不简单地由产能储备、基建稳定投资来决定,其与人力资源再配置效率、社会支持能力等息息相关。如,在面对突发性经济冲击、行业转型时,教育体系是否具备快速培养、再培训的能力,直接影响着劳动力能否成功地从衰退行业过渡到新兴领域,且公共卫生体系和基层社区治理能力是否充分达标也关乎“物”的供给体系能否稳定运转。因此,“人”这一要素既是生产端的重要后盾,也是风险应对、系统修复工作中的关键节点。在全球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结构性问题互相缠绕的背景下,忽视人的投入会削弱经济系统的韧性,而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则会明显提高经济系统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进一步地,在转型发展中要想形成有效的结构性支撑,就要打破以往的惯性路径。1978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仅29.8%,2000年后快速攀升,2010年达到70.1%的峰值,2024年则维持在38.6%左右^[4],长期高于发达国家20%~30%的合理区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8年,我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不足2%,2012年才突破4%,此后稳定在4%左右,2024年为4.02%^[6],与世界平均4.3%和OECD国家平均4.9%的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与此同时,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在1978年为3%,2024年升至6.7%^[7],仍大大低于高收入国家8%以上的水平。因此,要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要求对教育、卫生、职业培训等“人本领域”进行稳定的投入,也要求在评价项目绩效中把人的成长性成果纳入成本收益分析体系。在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

优势逐渐减弱,缺口问题越来越突出,单纯依靠资本和基建投入已经不能弥补经济发展的人力瓶颈,这就要求从经济结构优化的角度来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使其成为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前提条件。

2. 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释放发展新动能

随着人口红利逐步减弱、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严格、国际技术壁垒越来越高,投资于物不能持续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若将部分低效投资转移到劳动者技能提升和人力资本积累上,不仅能够缓解结构性失业,还可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实现‘降成本’与‘提效率’的双重目标。”^[8]“无论是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还是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都离不开人的努力和创造性作用的发挥”^[9],而创新平台、实验设备、数字基础设施等物质载体则为技术创造和扩散提供了基本条件。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存在相互依存性,若忽略人力资本的培养,即使有先进的设备和足够的资本投入,也很难取得持续性成果,甚至可能会出现技术系统空转、资源浪费等情况。同样地,若缺少足够的硬件条件依托,创新活动难以付诸实践,技术成果也难以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只有统筹“物”的资源基础及“人”的能力体系,才能攻克创新链条中的堵点,挖掘发展新动力。目前,我国部分地区仍面临研发基础设施投入偏重且高层次人才稀缺的问题,以河北省为例,其2024年R&D经费967.8亿元,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但每万人博士、高层次人才数量不到北京的1/10、天津的1/3^[10]。也有人集聚到了一定规模但转化平台不足的状况,以武汉市为例,其高校数量、研究生规模均居全国前列,是中西部最大的科教人才高地,但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数量不多,大量成果仍缺乏验证平台^[11]。因此,只依靠某一方面投入,无法促成技术链与产业链的高效协同,唯有驱动“人-物”协同成长,才能提升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产业转化三者的衔接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12]与传统制造业相比,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加依赖知识密集

与高能劳动,对人力资本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推动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共同进场,“既推动传统产业通过工艺创新实现流程再造,也支撑新兴产业通过颠覆式创新开辟新市场,形成新旧动能转换的持续驱动力”^[13]。特别是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领域,通过构建以职业教育、高端培训、技术再学习为核心的支撑体系,能够显著提高产业体系在快速变化中保持持续创新的能力。因此,要真正形成新动能,应把“物”的建设与“人”的培养作为一个统一的投入系统进行规划。

3. 提升人口素质与增进社会福祉,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经济体系中物质资本投入更容易获得重视,因为其回报直观且可统计,而投资于人所带来的效果具有缓慢释放、周期较长、成果不易量化等特征,因此在政策推进过程中,后者往往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当前人口结构进入深度转型的新阶段,劳动力总量增长趋缓,结构性短缺日益明显,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压力同步上升。“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4],如果不从源头上提升人口素质水平,整个社会将面临人力资源瓶颈、群体发展不均衡、社会流动受限等多重危机。要真正提高人口素质,单靠个体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公共投资的方式提供教育、健康、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持。截至2024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0.7亿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为2.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3亿人^[15]。庞大的社会保障网提高了全民的福利水平,保障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也给居民安心消费、长期人力投资提供了有力保障。与此同时,这些人力资本投入的承载和实现也离不开相应的物的支撑,无论是教育体系的优化还是医疗资源的普及,都需要依赖学校、医院、社区服务设施、信息系统等物质平台。只有在硬件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对人的发展持续投入,才能保障好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运行的连续性与公平性,进而推动社会整体素质均衡提高。

从社会福利的视角看,把“人”的成长与“物”的建设同步谋划,可切实防止公共投资碎

片化,提高社会政策的综合质量与协同效果,由此构建一个普惠、可持续的福利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6]提升公共住房、交通设施、信息网络等基础物资投入的普及度和服务水平,可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平等获取公共服务的契机。就“人”的层面而言,需强化对边缘群体、弱势群体、流动人口的教育保障、健康干预及技能提升,从而提升其参与社会分工的能力与获取发展的机会。这种双管齐下的投入办法,既增进了个体的发展水平,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公平性与包容性的提升,是驱动社会福祉增长的制度根基。

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内在逻辑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非简单的资源并列或领域叠加,而是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 with 结构互补性的体系安排。二者不仅表现为发展本体的统一,更在目标层面共同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在路径层面呈现动态互促的演进过程,在结果层面形成经济动能与社会价值的深度共生。

1. 发展本体的统一性:确立“物”与“人”的辩证协同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认识并处理“物”与“人”的关系,不但是一个发展策略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价值立场和本体论逻辑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指出:“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7]。人的实践活动是推动物质财富积累的出发点和归宿,经济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既依靠物的增长,又应该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物”是人们改造自然、创造价值、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目的和动力的来源,二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互动统一之中。就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而言,两者分别对应发展基础和发展主体两个方面:前者是实现社会功能的物质基础,是提高生产效率、完善城市功能、推动技术进步的外在条件;后者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人的能力的提高,是激发资源潜力、增强社会韧性的内在

力量。一旦将两者割裂,过分强调“物”的增长而忽视“人”的能力培养,就会出现物质富裕和社会焦虑并存、基础完备和人才短缺交织的矛盾;若脱离现实物质条件,片面强调以人为本,就会陷入资源支撑不足、发展落空的窘境。只有确立“物”和“人”的统一体观,才能把握现代化的根本规律,使发展导向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融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物的建设”与“人的发展”都被纳入国家战略体系。这种统一性体现的是系统性思维,即所有的投资活动都应指向人类福祉的提高,也必须在人的可持续发展中实现其价值归宿。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发展本体的统一性要求各种投资要打破“重物轻人”或者“就人论人”的片面化思想,要求将基础设施、科技投入、教育培训、公共健康等系统连接起来,把城市扩张、人口流动、技能转移等策略结合起来,使投资于物的成果在投资于人的基础上得以发挥作用,使投资于人的潜力通过投资于物的支撑得以实现。

2. 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发展不仅是对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是对人的自由与能力的拓展。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出发,“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18]这一价值导向明确了经济增长的目标必须落脚于“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9]。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发展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正是在价值取向上统一于这一核心导向。从历史经验来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等‘物的投资’立竿见影,极大助力了我国经济起飞。”^[20]然而,这种以硬件优先为主的投资结构在逐步推进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了片面性: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完善并未自动带来人的素质提升,社会服务的短板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单纯追求产能扩张容易诱发资源错配和发展失衡,导致一部分群体和地区在物质富裕的同时面临人力资本匮乏、社会功能滞后等现实

困境。这一发展偏向说明,若不将发展目标统一到“人”的发展上来,物质基础建设再充分,也难以构成长期稳定的社会发展支撑。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就是要超越短期的、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通过进一步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1]。这就要求对投资于人的重视要与投资于物实现制度上的等值地位与资源上的协同分配。“基础性民生工程通过公共资源的战略性配置,能够使教育、医疗、住房等基础领域回归其作为人类再生产必需品的本质属性,通过构建底线公平机制,为每个社会成员铺设抵御风险、向上攀登的阶梯。”^[22]真正实现投资于人,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3]同时,将“物”与“人”的投入协调起来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增强发展动员力与治理合力。

3. 发展路径的互补性:“快变量”与“慢变量”的协同演进

投资于物的快速见效,大多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设备更新替换或者数字平台铺设等方面,能够直接使生产能力得到提升、交通运行效率得到提高、产业空间布局得以改善,从而在短期内促进经济活动的明显增长。据统计,2010—2019年我国GDP年均增速7.7%,其中资本积累贡献率高达71.4%、劳动力数量贡献率1.6%、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约27.1%,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动力主要源于资本快速积累^[24]。在特定阶段(如经济下滑压力大、区域发展滞后时),投资于物可以迅速产生拉动作用,是政策调控操作中不可缺少的手段,但若缺乏长期视野,则会出现效率递减、资源浪费、产能闲置等问题。

与之相对,投资于人主要表现在教育体系、职业培训、基础健康、社会治理等方面,其效果一般滞后于投入周期,不能在短期内表现出经济指标的迅速上涨。“人力资本积累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不仅能不断提高个体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还能通过技术创新和知识扩散带来范围

经济效应,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进步。”^[25]二者一快一慢的属性特征,决定了其结合的核心方法是协同演进,既要发挥投资于物的短期拉动作用,为投资于人奠定物质基础;又要重视投资于人的长期积累作用,为投资于物注入持续动力,实现快与慢、硬与软的同频共振。但在实践中,二者结合存在协同脱节的现实问题,即在规划上各自为政,物的基础设施项目和教育、职业培训等人本投入项目分别立项、单独推进,部分产业园区、交通枢纽建成后由于缺少配套的人才支撑和服务体系而低效运行;投入上重快轻慢,财政资源不断向周期短、回报快的物的投资倾斜,教育、医疗等需要长期投入的人本领域缺少制度性的稳定保障,部分地区物的建设更新速度远超人力资本培育节奏,先进的设备和平台因为缺乏高素质人才操作而难以发挥效能,而部分地区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物质平台需求脱节,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在国际实践中,德国“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较为典型的发展路径互补范式。在该模式下,学生企业在企业进行实践训练,同时在职业学校里系统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企业根据自身设备、工艺的更新同步参与人才培养,保证技术能力与生产需求相匹配。这一制度打通了物的建设与人的培育之间的断层,使产业更新速度与人力资本积累的节奏达到一致,避免了投入错位造成的浪费^[26]。实践证明,该机制保证了德国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提高了青年群体就业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体现了“快变量”与“慢变量”的制度性协同价值。因此,在物质基础高速建设时期,必须同步加强教育资源的配置、技能训练体系的建设、职业流动通道的设计等,使人力资源的增长和物质系统的发展相适应,这不仅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更能增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防止由于投入失衡造成的发展停滞。

4. 发展结果的共生性:构建“经济-民生”的双循环互动格局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之间不是自然的、线性的关系,而是需要依靠有效的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机制来达到双向传导的目的。发展成果能否在各个群体之间实现公

平分配、民生质量能否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提高,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是否稳定、社会运行是否高效。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投资导向人的多维度需求、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创新和高质量增长,在民生改善和高质量增长之间,在宏观经济短期平衡和长期可持续增长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和相互牵引”^[27]。从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说,投资于物主要是提高供给端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平台扩展、科技装备更新等方式提高社会整体生产效率。这种投入对于产业体系的优化、技术演进、区域发展空间的扩展有重大意义,短期内可对经济增长起到支撑作用,但是若没有配套的人的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政策,产能扩大就很难和消费能力同步,从而导致供需失衡和过剩问题。投资于人则更多集中于提升需求质量和社会系统的承载力,“通过财政投入、金融支持等手段,为满足人的发展需要提供坚实的经济保障”^[28]。这种作用虽不具有短期拉动性,但能决定市场规模的稳定性与消费结构的升级方向,是经济循环可持续运行的前提。

从现实来看,二者结合的成果闭环尚未完全形成,还存在“经济-民生”循环不畅的突出问题。一方面,经济增长向民生改善转化传导不足,部分地区投资带来了经济总量增长,但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高,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均,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不足,不能形成对经济发展的持续拉动;另一方面,民生改善向经济增长的反哺作用发挥不够,部分地区的人本投入不能与产业发展、物质平台建设有效衔接,人力资本提升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生产效率 and 创新能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不能与产业供给结构优化匹配,导致内需潜力无法充分释放。2025年的《世界幸福报告》印证了北欧国家在经济民生协同发展方面的卓越表现,芬兰居于榜首,丹麦、挪威、瑞典也在前十之列^[29]。这些国家长期坚持高税收、高福利、高教育投入的制度安排,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把大量公共资源用于教育、医疗、托育、住房等人本领域,用普遍性且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了全社会的就业参与度、创新能力和社会稳定性。以瑞典

为例,其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常年保持在6%以上,医疗体系实行全民覆盖,形成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导向的增长模式,有效实现了从物的基础设施到人的生活保障的系统转化,使经济发展成果可以稳定地反哺民生,提高了社会对经济政策的支持度及制度的内在弹性^[30]。我国国情与北欧国家的国情有着巨大的差别,不能简单套用后者的制度安排和做法,而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新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因此,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要在二者之间找到内在联系点和协同机制,推动经济成果向民生领域转化,将经济增长带来的财政收入,更多投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人本领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缩小区域、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消费能力。推动民生改善向经济增长反哺,将投资于人与产业发展、物质平台建设深度融合,通过职业培训、技能提升让人力资本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通过提升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释放消费潜力,拉动内需增长,为投资于物提供新的需求导向。

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实践方略

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念落到实处,关键在于以更高效率的配置机制、更紧密的协同体系和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安排,推动“人-物”要素在各环节实现系统嵌合。

1. 优化投入结构配置,树立“人的全面发展”导向的投资理念

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协同推进的实践中,优化投入结构配置的核心是打破“重物轻人”“唯经济回报”的惯性思维,从体制机制上强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投资理念,让投资安排既服务于经济发展需要,更能回应人的生存、发展、享受等多重需求,保障人的发展权利、提升人的生活品质、促进人的能力跃升。

第一,科学规划财政投入方向,增强人本类支出的制度稳定性和增长弹性。长期以来,在财政资源配置中,物质项目因周期短、回报快、考核清晰而更容易获得预算支持,而人本支出

则因难以量化、收益滞后而处于相对劣势。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在顶层设计上强调人本投入,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优化投入配置,就是要摒弃以“短期经济回报”为核心的财政资源配置逻辑,将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文化建设、公共服务等关乎人的全面发展的领域,纳入财政投入的优先保障范畴,建立稳定支持机制,使这类支出不受年度经济波动或项目变化影响。同时,通过建立多年度滚动规划机制和绩效评估模型,提升人本类投入的可预期性和政策权威性。财政体制内部调整项目评审与资金分配标准,使其更加关注投入是否促进群体公平、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从而推动公共资金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理顺投资结构中的功能分工关系,推动基础设施与人力发展资源统筹配套。在实践中,一些投资项目集中于物质形态建设,缺乏与之匹配的服务要素与运营支撑,导致资源空置或使用率偏低。如,一些新建园区、交通枢纽和社区空间虽在空间尺度和技术装备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但因未同步考虑人才引进、教育医疗配置或社区服务体系等,难以吸引人口和产业的持续集聚。优化投入配置需要打破“重物轻人”的惯性,在投资项目评审环节引入人的因素,确保硬件投入与人的承载能力同步匹配。在交通、住房、数字平台等基础项目中,应将其服务于人力流动、社会流转和群体平等发展的功能明确纳入建设指标体系,将基础硬件项目与教育配套、医疗服务、社区建设、文化设施、养老托育等人本服务项目打包实施、统一规划,从空间、资金和功能维度实现整体推进,避免出现“硬件完备而服务缺失”的发展困境,让物的建设真正服务于人的生产生活需要。

第三,要创新多元投入机制,激发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人本导向型投资。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只依靠政府财政难以完全覆盖所有领域,为此要建立更灵活、协同、开放的投入体系:一方面,引导企业把人力资本投资认定为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对技能培训、员工福利、家庭支

持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采用税收减免、项目贴息、人才扶持基金等方式,激励企业在教育、健康产业和社区支持服务上开展布局。另一方面,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公益机构及社区平台等非政府主体,在公共服务体系中发挥补充及创新功能。社会组织等主体掌握群体差异及基层需求,在教育公平医疗可及、老年照护等方面有灵活性与响应性是促进人本导向投资体系建设的核心力量。

2. 提升协同投入效率,推进关键领域“物—人”融合与社会服务创新

现实中的一些地区在公共资源投放中存在职能分割、系统孤立等问题,导致“物”与“人”难以实现有效衔接,投入效果无法形成合力。要扭转这种状况,关键在于围绕融合导向,打破传统惯性,通过机制创新与流程再造,提高不同类型投入的衔接度、互促性和整体效能。

第一,建立全环节协同设计机制,推动项目系统融合与人本化建设。改革现行投资体系中单一功能属性分类立项的模式,从顶层设计阶段起就将人的全面发展需求作为基本要素纳入“物”的建设逻辑。在教育、医疗、科研、养老、托育、文化、社区治理等重点民生领域,硬件设施的投入必须与师资引育、服务能力建设、专业队伍保障、人文环境营造等同步谋划、同步实施、同步验收,确保基础平台不仅“建得起、建得快”,更能“用得好、惠民生”。推动建立跨领域联合立项机制,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社会影响评估中,增设人的发展指标、社会服务指标、民生福祉指标,改变过去以物理完成度、经济回报率为主要的评价导向。

第二,要健全重点领域的组织联动机制,推动政策执行环节的资源整合与要素耦合。破解部门职责边界分明、信息共享不足、投资各自为战的问题,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服务协同,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平台,将发改委、财政、人社、教育、科技、卫健、民政、文旅等相关部门联动纳入统一工作流程,通过共建共享平台推动数据互通、资源融合与项目联动。地方层面可探索设立跨领域融合投资专班或综合协调小组,打通原有条块分割,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布局、公共服务供给等工作中,实现“物的

建设”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指挥、同步实施与动态调整,避免资源重复、功能重叠甚至相互掣肘,提升协同投入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支撑效能。

第三,要推动关键领域形成融合示范模式,以具体项目牵引“人-物”结合的深层转化。在具备转型条件和实际需求的重点区域,可通过试点示范项目引导投入模式创新。如在国家高新区、新型城镇化试点、产业集群核心区等区域,要设立一批围绕融合理念打造的综合型投资项目,将基础设施、技术平台与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统筹打包推进,探索形成“平台+能力+服务”的协同投入模式。在推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同步引入面向人力资源开发的配套机制,包括职业培训基地、技能认证体系和就业服务平台建设,使产业发展具备更强的人力支撑基础,这类试点实践一方面可为全国推广提供经验样本,另一方面也能推动地方形成系统思维,逐步从个别融合走向全面协同。

3. 健全跨区域统筹机制,推进区域协调与群体均衡

在区域发展持续深化、城乡格局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如何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配置,是提升整体发展协调性与包容性的关键。健全跨区域统筹机制的根本目标,是要通过制度安排打破空间割裂与群体壁垒,使物的基础条件和人的发展机会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协调布局与均衡提升。

第一,要构建统一协调的区域发展规划体系,实现投资目标和空间布局的深度融合。目前的区域发展规划中仍存在产业优先与人口政策脱节、基础设施集中与公共服务滞后等结构性矛盾,导致一些资源型、制造型区域形成了“物在此、人不在”的发展模式。要打破这一困境,需要从国家层面推动区域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财政安排、人口政策等多个系统的耦合,确保“物”的规划中充分纳入“人”的发展需要。在国家重大工程布局中,要加强与人口迁移趋势、劳动力结构演变、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等要素的联动设计,引导重点项目向

具有人口承载潜力、社会服务基础良好的区域倾斜,避免孤立建设和重复投资。针对城市群、都市圈、边疆地区等重点板块,要统筹安排基础设施网络、教育医疗资源与人才流动机制,推动形成人口与产业相互吸引、物与人同步成长的空间格局。

第二,要优化财政转移支付与要素支持政策,增强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承载力与人力发展能力。地区间财力结构不均直接影响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人力投入水平,造成“物的欠账”与“人的短板”并存的困局。为提升统筹效能,需进一步优化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均衡性转移机制,将教育、健康、就业培训等人本类支出作为重点考核指标,建立与区域人口结构和发展需求相匹配的资金分配公式。同时,针对中西部、农村、边远等区域,应加大对基础设施薄弱领域的长期投入,为教育医疗平台建设提供坚实物质支撑,形成“以物促人、以人稳物”的互补机制。在要素配置方面,要通过财政贴息、用地倾斜、项目对接等方式,引导优质资本、技术与人才向薄弱地区集聚,实现资源的再平衡和人力资本的再培育。

第三,要建设跨区域共享型公共服务体系,保障不同群体平等获取发展资源与成长机会。“持续优化民生投入结构,将资源更有针对性地投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和困难群体,是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最直接有效的途径。”^[31]推进建立跨区域教育联合体及医疗协同机制,保障优质学校、重点医院设立分支单元及成立流动集群或建立远程平台,为欠发达地区开展常态化的帮扶支撑。针对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应改进跨区域社保接续、异地看病报销、孩子就学等政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促进国家层面统一拟定人力资源发展目标,界定地方政府在区域统筹中的主体责任,探索创建按人员随地点流动配置资源的财政与管理机制,让服务供给体系真正跟人口分布及发展需求相匹配。同时,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程度及服务能力,采用信息化办法冲破时空壁垒,让优质服务资源经数字手段下沉到城乡不同群体,为人的能力积累与福祉提升提供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支持路径。

4. 完善多元主体协作体系,推动“人-物”融合落地见效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协同性,既非单一领域或部门所能推动,也非孤立政策可以实现”^[32],必须依靠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基层力量共同参与、合理分工、协同推进。“多元参与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效应,平衡复杂利益诉求,实现投资的多重价值。”^[33]完善多元主体协作体系,就是要推动不同类型、层级和功能的主体围绕共同目标形成常态化合作机制,将政策动员力、资源整合力和服务执行力统合起来,确保“人-物”融合落实到区域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全过程与各环节。

第一,要厘清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在“人-物”融合中的职责边界,构建分工合理、协作紧密的责任格局。“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为社会投资营造良好环境,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34]特别是在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耦合性不强的地区,需从整体层面协调物的投资方向与人的发展路径,制定融合导向的支持政策,引导其他主体共同发力。企业作为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提升的重要推动者,应主动将人力资本投入纳入自身发展战略,不仅要关注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更要注重员工技能提升、岗位匹配和职工福利,真正实现以人促技、以技育人。社会组织在弥补服务空白、承接公共项目、激发基层活力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特别是在教育帮扶、健康管理、社区治理等领域,能够深入接触群众、回应个性化需求,是推动“人-物”要素深度融合的重要承载者。

第二,要完善多元主体协作的平台机制,构建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与任务协同的运行体系。协作效能的提升离不开稳定高效的制度平台作为支撑,各地应依托已有的区域发展协调平台、公共服务平台或重大项目推进平台,设立面向“人-物”融合的专项协作机制,实现规划共商、信息共用、项目共推。在关键领域,由发改、财政、人社、住建、教育等多个职能部门组成专门工作组,定期会商任务,统一资源调度,强化跨领域、跨层级的协调执行能力。同时,鼓励基层

单位与社会力量联合开展试点探索,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引入职业教育资源同步推进技能培训,在产业园区建设中同步引入幼儿托育、职工食堂和文体空间,以实现“物”的设施建设与“人”的生活发展同频共振。

第三,要通过政策激励与制度安排,提升多元主体参与融合发展的积极性与持续性。需优化政府采购及补贴机制,扩大政府跟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范畴,促使更多非政府主体能以市场化手段参与“人-物”融合项目。同时,优化绩效评价体系,将“协同贡献”“融合程度”“社会成效”等指标归入项目评估维度,对承担关键任务且取得突出成效的主体给予积极激励。在制度建设方面,应推进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的更新完善,为多元主体彼此之间的合同关系、权益分配、责任承担等给出清晰依据,保障各方在合作期间的合法权益及合理预期,最终形成可长久持续的合作关系。

四、结 语

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所面临的一项经济结构调整任务,也体现出党在发展理念上的系统性深化和时代性进步,这一命题不只关乎发展方向的转变,更牵涉发展方式、发展路径及实践推进机制的深刻转变。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要求我们要跳出以往那种以物为主、以快为优的常规逻辑,用更完整、协调、可持续的视角确立资源配置与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是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还是社会结构的优化调整,都必须以此作为关键引领要素,从而推动整体发展水平和民生保障能力共同跃升。未来阶段的政策探索,应把焦点更多地放在从结构性调整走向体系性重塑上,从单项政策推进过渡到跨部门协同治理。在技术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社会分化程度逐步加深的背景下,唯有通过“人-物”的投资融合,才能真切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实现资源运用效率与社会公平水准的双重提升。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

- 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14.
- [2] 钱诚.投资于人有何深意[N].经济日报,2025-06-03(10).
- [3]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84.
- [4]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5-02-28)[2025-11-03].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 [5] 盛磊,应晓妮,刘立峰.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理论、经验和路径[J].宏观经济研究,2025(7):31-38.
- [6]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24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EB/OL].(2025-12-31)[2026-02-05].www.moe.gov.cn/srcsite/A05/s3040/202512/t20251231_1426092.html.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5-12-02)[2026-02-05].<https://www.nhc.gov.cn/guihuaxxs/c100133/202512/flc3a3c617484a27a1a26a468afbaeee.shtml>.
- [8] 王赞新.以投资于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N].光明日报,2025-03-12(09).
- [9] 盛朝迅.投资于人,构建人力资本优先的发展生态[N].解放日报,2025-03-25(09).
- [10] 河北省统计局,河北省科学技术厅,河北省财政厅.2024年河北省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OL].(2025-10-28)[2026-02-05].<https://kjt.hebei.gov.cn/hebkjt/xwzx15/tzgg35/sttz15/2025102816274541155/index.html>.
- [11] 武汉市科技创新局.武汉市科技创新局持续推进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建设[EB/OL].(2025-05-14)[2026-02-05].https://kjt.hubei.gov.cn/kjdt/sxkj/wh/202505/t20250514_5650427.shtml.
- [1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02.
- [13] 刘志彪,孙文婷.投资于人:发展动能转换的逻辑与产业政策取向[J].南京社会科学,2025(9):30-40.
- [1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98.
- [15]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EB/OL].(2025-07-25)[2025-11-03].<https://www.mca.gov.cn/n152/n165/c1662004999980006089/part/21508.pdf>.
- [16]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503.
-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5.
- [18]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颐,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
- [1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432.
- [20] 求是网评论员.投资于人,见物更见人[J].红旗文稿,2025(18):48.
- [21] 朱宝琛.投资于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支撑[N].证券日报,2025-10-27(A01).
- [22] 魏传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公平正义叙事体系[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10(9):16-28.
- [2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5.
- [24] 国家信息中心.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变革研究[EB/OL].(2021-01-18)[2025-11-05].https://www.ndrc.gov.cn/wsdwhfz/202101/t20210118_1265122.html.
- [25] 凌永辉.深入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高效协同[J].群众,2025(19):15-17.
- [26] 杨蕊竹,孙善学.德国二元制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特征与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23(10):94-101.
- [27] 于春海.以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全方位扩大内需[J].人民论坛,2025(9):12-16.
- [28] 李海辰,杨蔚.深入理解投资于人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进路[J].经济学家,2025(9):36-46.
- [29] JOHN F, RICHARD L, JEFFREY D, et al.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5)[EB/OL].(2025-03-20)[2026-01-19].<https://www.worldhappiness.report/ed/2025/>.
- [30] 张建刚,王珺.北欧国家福利制度困境、演变趋势及其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启示[J].上海经济研究,2023(1):102-111.
- [31] 熊丽.投资于人就是投资未来[N].经济日报,2025-10-17(05).
- [32] 倪红福,王晓星.以投资于人推动高质量发展: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J].改革,2025(6):42-55.
- [33] 刘立峰,应晓妮,盛磊.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的内涵、特征和趋势[J].宏观经济研究,2024(11):56-66.
- [34] 尹庆双,肖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J].红旗文稿,2024(23):30-33.

The Logic Reasoning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Closely Integrating “Investment in Physical Capital” with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 Tu Liangchuan, Liu Yanfe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investment in physical capital” and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cus for enhancing nation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nd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ir close integration can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and achieve the unit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shared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entity, they establish a dialectical and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and “human”.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goal, they adhere to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they reflect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fast and slow, hard and soft.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utcome, they form a mutually reinforcing and advanc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system. Going forward,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still requires systematic efforts in such areas as structural allocation,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regional planning, and actor collaboration, so as to optimize resource distribution, enhance policy effectiveness, and promote the mutual integration and synergistic enhancement of various input factors. By building a development system oriented toward integration, we will gradually form an overall pattern in which material development promotes human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improves quality, and material and human development reinforce each other, so as to provide more solid support and a more stabl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15th Five-Year Plan;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physical capital; Chinese Modernization; human capit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